

近代中医期刊“一稿多刊”现象研究^{*}

张培富¹⁾ 刘 洋^{1,2)†}

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030006;2)山西省卫生计生委员会新闻中心,030013;太原

摘 要 近代中医期刊勃兴,作为中医传播的媒介,学术交流的渠道和“中西医论战”的平台,中医期刊发挥了积极作用。近代中医期刊中大量文章在保持完全不变,或稍加调整的情况下,在不同期刊甚至同一期刊上反复刊载,且文章和作者数量都远胜于当代。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法律制度、学术体制有关,这实质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特殊的中医学术传播方式。

关键词 近代中医期刊;传播;一稿多投;“一稿多刊”

Phenomenon of “multi-publication with one draft” in medical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ZHANG Peifu,LIU Yang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journals were initi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s the medium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CM, academic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platforms of “debate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journals of TCM played a positive role.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repeatedly in different journals and even in the same journal, with some of those completely unchanged, or only slightly modified. The number of such articles and authors are much more than the contemporary ones. Not the authors bu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legal and academic system should be mainly attribute to for this phenomenon. It was a special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TCM in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Keywords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ropagation; duplicate submission; multipublication with one draft

First-author's address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030006, Taiyuan, China

DOI:10.16811/j.cnki.1001-4314.2017.01.007

1 “一稿多刊”现象及其特点

1.1 现象示例 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1],成为近代期刊滥觞的法律基础。科学期刊改变了古代的关门授徒、登门造访、口耳流传、函札往来、著述刊布等传统的传播方式,其专业程度高,目标对象精准,保存周期更长,重复阅读率更高,迅速为人接受^[2]。加上鸦片战争以后,西医传入的冲击和“科玄论战”中对中医生存空间的挤压,导致

20世纪20年代中医期刊勃兴^[3]。近代中医期刊是学术交流传播的媒介,也是与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到1949年,先后创办的中医期刊有400余种。由于迅速膨胀的期刊数量与有限稿源之间的巨大矛盾,以及中医从“口传心授”向大众广布的传播模式转变中,引用注释制度的缺乏,造成了近代中医期刊中有许多文章在题名、署名、内容保持完全不变,或只作个别字词调整后,在不同期刊甚至同一期刊上反复刊载。其实质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医期刊特殊的传播方式,并非完全作者主观故意的“一稿多投”,故称为“一稿多刊”现象,见表1。

1.2 研究方法 1921年由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内容丰富、辐射全国,连续出版到1937年,是近代发行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的中医期刊之一,在近代中医界居重要学术地位^[4]。统计《医学杂志》17年间的所有作者发文数量,获得高发文作者群。由于这些高发文作者,也在其他主要中医期刊上发表文章,且时间跨越整个近代^[5];故再以这些作者的姓名为检索词,从上海图书馆的《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49)^[6]中,搜索近代他们发表的全部医学文章,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1.3 结果统计 经统计,在《医学杂志》中发文总数20篇次以上的作者有26人,其中张锡纯、时逸人、张山雷、黄国材、周小农、沈仲圭、杨百城等系近代中医巨擘。虽然人数只占《医学杂志》作者总数的3%,但他们在该杂志共发表文章1343篇次,占杂志载文总数的44.1%。查阅整个近代期间,他们从1905年到1949年在86种中医期刊上发表文章4988篇次。

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比对、判定,有19人的476篇次文章属“一稿多刊”,占全部样本作者数的73.1%和样本作者发文总数的10.4%。这些文章分别刊载于71种中医医学期刊上,见表2。

样本作者群“一稿多刊”的文章比例和涉及作者比例远高于2007年国内学者调查获得医学类“一稿多投”5%~6%的比例^[7],以及2004年国外学者调查获得医学类8%~9%的比例(包括进行一定修改的文章)^[8]。这些“一稿多刊”基本是原文刊登,或者仅仅修改题名中的个别字词,而作者又系近代中医界学识渊博的理论大家,其发生原因绝非“学术不端”所能解释。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C720012);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131099)

[†] 通信作者

表 1 近代中医期刊“一稿多刊”示例

文章题名	作者	刊名	发表年份
痘症论治	杨星垣	医学杂志	1926
痘症论治	杨星垣	医学杂志	1929
当归之调经作用	沈仲圭	中国药报	1930
当归调经之实例	沈仲圭	广济医刊	1931
当归之调经作用	沈仲圭	长寿(上海 1932)	1933
为谋自救之计敬告同仁书	张治河	现代中医	1936
为谋自救之计敬告同仁书	张治河	医界春秋	1936
为谋自救之计敬告同仁书	张治河	医学杂志	1937
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解及治法	张锡纯	医学杂志(吴兴)	1920
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治法	张锡纯	浙江医药月刊	1930
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及冬不藏精春必温病治法	张锡纯	中医世界	1930
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解并论及其证治	张锡纯	杏林医学月报	1930
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及冬不藏精春必温病之治法	张锡纯	神州国医学报	1932
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及冬不藏精春必温病治法	张锡纯	医学杂志	1932

表 2 样本作者群“一稿多刊”情况(1905—1949 年)

作者	总发表文章 篇次	一稿多刊 文章篇次	一稿多刊 比例/%	登载刊物种数
沈仲圭	1 055	191	18.1	56
张锡纯	590	83	14.1	18
张山雷	261	30	11.5	7
时逸人	501	23	4.6	9
刘蔚楚	171	22	12.9	5
周小农	560	21	3.8	10
费泽尧	88	20	22.7	6
张汝伟	314	20	6.4	11
张治河	119	18	15.1	12
徐相任	140	14	10.0	8
杨星垣	76	7	9.2	2
王肖舫	248	6	2.4	6
赵意空	140	6	4.3	4
杨焕文	79	5	6.3	3
杨永超	35	4	11.4	4
黄国材	145	2	1.4	2
王 焜	29	2	6.9	2
张文元	30	2	6.7	2
合计	4 581	476	10.4	71

1.4 “一稿多刊”的分型 这些“一稿多刊”现象有以下 3 种类型:

1)同一文章在同一刊物反复刊发。文章再次发表时题名、内容完全相同。此类数量很少,共有 2 组 4 篇次,发表间隔 3~4 年。如 1926 年《医学杂志》第 34 期,杨星垣发表了《痘症论治》《麻症论治》2 篇文章,但 1929 年《医学杂志》专栏集中介绍痢症、白喉症等传染病的“急要治法”时,又将杨星垣以上 2 篇文章刊载,署名为“前人”。

2)同一文章在不同刊物刊发。这种类型数量最多,共有 162 组 404 篇次,多间隔 0~2 年发表,最长间隔 21 年。创刊于 1908 年的《绍兴医药学报》因人员改组,于 1924 年拆分为《绍兴医药月报》和《三三医报》2

刊。其间张锡纯的投稿《答医界同人问双修之道》,被 1924 年第 12 期《绍兴医药月报》和 1924 年第 14 期《三三医刊》分别刊发。

3)题名稍做调整,内容基本不变,在不同刊物发表。共有 33 组 68 篇文章,间隔多在 0~1 年。例如:沈仲圭将《当归之调经作用》题名改为《当归调经之实例》,先后在《中国药报》和《广济医刊》上发表;张汝伟将《气不足便是水论》改为《气不足便是水说》,先后在《绍兴医药学报》和《医学杂志》上发表。

出现第 1 种类型的原因,显然是因为期刊需要,期刊编辑为之。第 2 种类型,间隔时间较长,却是原文照登。如果是作者主观的“一稿多投”,在已有刊物登载的情况下,不可能只字未改,应该是这些名家的文章被其他刊物转载引用。第 3 种类型,在不同刊物的发表时间接近,并将文章题名、内容稍做了调整,可以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稿多投”,但这一类总体数量偏少。

2 原因分析

2.1 期刊:稿源缺乏和传播需要 近代中医期刊的蜂起集中于“五四”运动前后,共有 250 余种中医期刊创办,与之相矛盾的是稿件来源紧张。《三三医报》编辑披露说,“凡来稿没有不登载的”,并委婉解释“因为医界皆不曾作文,皆不好作文,今居然也要作文了,所以不选择”^[9]。《卫生报》苦于稿件的匮乏,发出号召:“《常识栏》的篇幅亟需扩充,希望爱护本刊的读作赤诚相助。”^[10]既然对投稿“不选择”就刊登,自然就有重复发表的可能。在向作者呼吁,满足杂志的用稿量的同时,杂志也希望提高稿件的质量,于是采取向名家约稿或转载名家已发表的佳作的方式。时逸人在民国后期创办了《复兴中医》并任主编。由于《中国医药月刊》(北京)的发起人董德懋、施今墨等与之捻熟,时逸人被

聘为特约撰稿人。时逸人为《复兴中医》撰写文章的同时,又多投给《中国医药月刊》(北京)。于是,1941年《我也谈谈伤寒》《研究中国医学几个信条》等几篇文章,同时在这2刊发表。

同时,由中医社团和中医进步人士举办的中医期刊,也是中医界联络的渠道和“中西医论战”的平台。近代爆发了一系列“中西医论战”,在中医期刊上发表文章,发动群众,参与请愿是当时重要的斗争形式。对改进中医、批驳西医文章的刊载被视为是期刊及其社团的立场^[11],对此类文章的广泛转载,不被认为在“一稿多投”之列。如张治河的《贡献当局医政刍见》于1937年同时在《中国医学》《现代中医杂志》《医学杂志》刊发,表明了这3家期刊对该文提出的主张的赞成。

2.2 法律:模糊与不对等 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始于1910年的《大清著作权律》,立法的缘由是“维著作一端,东西各国均设专律,确立范围,保证权力,故学问艺术日新月异”^[12]。律令的宗旨是鼓励著作者,保护著作权,规定“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有之,著作人死后并得其继承人继续享有三十年”。1914年12月北洋政府《大总统公布出版法申令》,承袭了著作人的著作权限;但重在对发行和印刷人严加管制,要求“出版之文书图画于发行散布前报警察官署备案”^[13]。这样,在著者的著作权得到重视的同时,从律条上却看不到期刊出版者享有文章的专有刊载权;因此,如果拥有著作权的作者将自身著作“一稿多投”,由于没有追诉主体,也就构不成违反法令,成为法律约束的模糊地带。

对期刊而言,由于律令规定“凡经呈报注册取得版权的作品,其他人不得翻印复制及用各种假冒方法进行剽窃”^[13],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一般没有提前“经呈报注册”,作者还不拥有版权,其他期刊在保持原文完整的情况下引用和转载并不违法。1931年司法院的判例解释也支持了这种观点^[14]。

近代出版界对文字剽袭深恶痛绝。笔者以“抄袭”“剽袭”“剽窃”为关键词,对《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49)文献进行全字段检索,得到264篇对“抄袭”问题有关的声明、公告或评论;但绝大多数限于文学类、社会类、科技类期刊领域,医学类只查询到1篇^[15]。查阅高产作者沈仲圭发表的1000余篇文章,未发现抄袭他人的文章。一方面说明中医界的抄袭现象并不严重,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对“一稿多刊”与“抄袭”是分别对待的。

于是,许多杂志一方面发布免责声明“凡有价值之关于医药作品,已先见于他种印刷品者,本刊为传布各著起见,得以转录”^[16],另一方面又排斥“一稿多投”,

说“唯一稿数投之作品,请勿加惠顾”。但采取的措施仅仅是“一稿两投概不给酬”^[17]。这样,从刊物自身没有对“一稿多刊”加以限禁,对作者又没有有力约束措施,发生“一稿多刊”在所难免。

2.3 规范:转载体例暂未形成 近代之初,由于现代意义上“摘要”“关键词”等学术规范还没有形成,“参考文献”的引用模式没有建立,将文章题名稍加更改,即认为与原文相异,拟引用者采取将原文全文转载的方式进行。

与中医期刊相比,脉承现代科学体系的西医期刊对转载其他刊物文章有较高的版权观念。《广济医刊》从1917—1930年间共有9篇文章,分别注明“转录”自《中华医学杂志》《华北医刊》《民国医学杂志》《健生医刊》等杂志。《中华医学杂志》1921年发表的《霍乱症一百医案之研究》,也注明“转录《齐鲁医刊》”^[18]。

同时,西医期刊通过刊物间的转载互动,逐渐形成了初具现代意义的转载格式。初期的转载只注明原著者姓名,随后在文章题名处增加了“转载”或“转录”2字,以后又增加了转载来源刊物名称、发表时间、刊登卷期等内容,甚至以双语标注。1926年,《齐鲁医刊》翻译发表J.W.Tome的《霍乱之预防法及其早期之治疗》,注明“Jour. Trop. Med. Hyg., July, 1926.”^[19]。1933年《天德医疗新报》在转载《江北痞块病》时,用中英文双语注明“转载《广济医刊》9卷9号”。

受此影响,部分中医作者的维权意识也逐步提高。1929年陆渊雷在发表《伤寒今释》时,声明“此稿有著作权,禁止翻印转载”。1931年承淡安在发表《针灸医话》时,注明“本人保有著作权”。民国后期,部分中医刊物在转载文章时也加以标注,如1940年,《新中医刊》发表《从统计中管窥中国医学》,注明“转载《国医导报》,第二卷第四期及第二卷第五期”^[20]。随着转载、引用体例逐渐形成,近代晚期中医期刊的“一稿多刊”现象也逐渐减少。

2.4 思想:开禁与约束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慎言为藏拙之计,以多议为愚好之识,于是噤口卷舌,宁受杖马寒蝉之消,以守知足不辱之戒”。中医药界尤其如此,中医的传承历来通过“口传秘授”,甚至如果传授对象选择“若非其人”,则“意死不敢妄传人”^[21];于是“近世医家,能博贯汇通有阅历经验者,每闭户著书,宝藏《金匱》,以传子孙,不肯刊布流行以公诸于世,竟有及第门人未获一观者”。张汝伟“奉劝海内高明之士,毋视医报为浮文,不妨各抒高见;毋以辩驳生倾轧,不妨互相琢磨;毋以密旨而不轻传,须知世承终难永”^[22],呼吁中医同人开风气之先,将著述公开。《医学杂志》多次刊登声明“家传秘方予以公开”的文章。

近世中医作者能将自己的临证经验刊发,是观念发生巨大转变,抱了决然勇气而为之的结果。这也造就了近代中医期刊在中医学学术传播中的特殊作用。

但既然拿定“公诸于世”的决心,著者的思维定式就要广为传布,而不仅限于一种期刊,浅尝辄止。加之许多中医期刊“昙花一现”,发行数量和传播范围有限,强求作者只能在一种刊物发表,有悖于其初衷,自然得不到作者的认可和遵守。

2.5 作者:传播与经济 一方面,有作者希望扩大传播效果的因素。期刊在近代中医界属新生事物,订和阅均有限。常熟张汝伟举例“吾邑城乡合计医药界不下千人,而订阅《神州医报》者不逾十份,订阅《绍兴医报》者不逾五数”^[22]。单纯在一种刊物发表文章,影响十分有限。1920年张锡纯因为“近见医报多有于此互相辩驳者”,在《吴兴医学杂志》上发表《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及治法》一文。事实上,之前的辩驳没有见诸报端,倒是该文发表后引发了长达14年的系列讨论。先后有暴振华、张国华、秦丙乙、孔宣礼等15人次在《中医杂志》(上海)、《镇江医学公会月刊》《杏林医报》《上海医报》等12家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磋商讨论。10年以后,张锡纯又在1930年先后将刊登在《吴兴医学杂志》的旧文选录刊登在《浙江医药月刊》《中医世界》《杏林医药学报》上。1932年的《神州国医学报》和《医学杂志》又原文转载,使这个讨论得以不断延续。直到1934年,中国医学院韦冠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辨》做了毕业论文,融汇各家学说而告终^[23]。张锡纯这篇文章的传播效应得到充分放大。

由作者主观故意“一稿多投”导致的“一稿多刊”,也可能是作者为了提高录用概率,加快发表速度。沈仲圭从1920年首次发文,到1949年共发表文章1055篇次,平均每年发表36篇次,放在当今也属高产作者。如此高的发稿量,除了创作量大以外,也与他投稿的范围广泛相关。许多稿件在多家刊物同时刊登,1929年,《发明血炭粉者为数百年前之汉医》就同时在《医界春秋》《中西医学报》《广济医刊》上发表。

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经济利益诱因,导致作者“一稿多投”;但是,近代中医期刊由于办刊经费紧张,大多稿酬微薄甚至没有现金酬劳。《医学杂志》对作者的酬谢是“凡经本会编入杂志之稿,本会奉赠杂志若干份,以酬雅谊”^[24]。《医界春秋》表示,稿件“一经出版,当以本社出版价值高贵之书籍奉酬”^[25]。《广济医刊》表示“编辑人胥尽义务,投稿者仅赠医刊”;该刊对于需要稿酬者也非一口回绝,但“如有佳作而投稿人需索酬者”,需要作者“篇末注明”,杂志会“酌量致酬”^[17]。环顾其时文史语言类的稿酬,则令中医期刊望尘莫及。

1934年,美国新史社的悬奖征文,一等奖达300美元^[26];林语堂的版税收入达到10%^[27]。所以,经济利益不是“一稿多投”的主要诱因。

3 结束语

“一稿多刊”是近代中医的特殊传播方式。

近代中医期刊萌生之初,中医著述完成了由古代“假托他人名义”到“署著者实名”的突破。传统的中医关门授徒、口耳流传、函札往来等传播方式实现了通过期刊广为传布的跨越,中医学的传播取得巨大突破。领风气之先的编辑和作者对期刊的传播效果预期很高,甚至希望通过在期刊刊载文章,实现“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的目标^[2]。面对“繁杂小散”的中医期刊局面,部分编辑和作者采取“一稿多刊”的形式,主要目的是扩大传播效力;所以,“一稿多刊”是近代中医的特殊传播方式。但由此带来的版面和编辑资源浪费,乃至读者负担的增加显而易见。

借鉴“一稿多刊”可以发现期刊的近缘关系。

不管是期刊主导的“一稿多刊”,还是作者为了扩大传播效果采取的“一稿多刊”,都在传播过程中建立了同一期刊与不同作者,同一作者与不同期刊之间的学术认同和互动关系,期刊之间“一稿多刊”的频率与它们办刊理念的接近度呈正相关;同时,“一稿多刊”文章的主题也是当时中医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因此,通过研究“一稿多刊”的频率和主题,可以为学界挖掘海量的近代中医医学文献提供一条便捷途径。

近代中医期刊“一稿多刊”现象的发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学术传播需要有关,反映了近代早期的期刊先贤和医家们,都曾走过一段不同于现在学术出版传播的道路。进入21世纪的今天,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学术传播途径,也更容易发现和鉴别恶意的“一稿多投”^[28]。相信著者的学术行为会愈来愈加规范,“一稿多刊”现象必然成为历史。

4 参考文献

-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A].北京:中华书局,1979:59
- [2] 张惠民.我国早期科技学术期刊的传播学思想研究[J].编辑学报,2005,17(2):81
- [3] 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第6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9:3
- [4] 刘洋,张培富.近代中医科学建制化之嚆矢: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例[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33(3):96
- [5] 袁桂清,汪镜.中国医学期刊编辑出版史初步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7,8(2):50